

#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崔明德 马晓丽 / 著



人民出版社

#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崔明德 马晓丽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张 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崔明德 马晓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524-0

I. ①隋… II. ①崔…②马… III. ①民族关系-民族历史: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K28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879 号

##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

SUITANG MINZU GUANXI SIXIANG SHI

崔明德 马晓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25 字数:550 千字

ISBN 978-7-01-009524-0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序 一

崔明德教授是中国民族史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2007年,由他主持、马晓丽教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已于2009年结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鉴定结论是:“该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梳理和全面研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学术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是一部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研究的力作’,‘将我国古代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sup>①</sup>。最近,我通读了他们的结项成果——《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一书,觉得鉴定专家的结论非常中肯。这里略谈几点感想:

一、该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学术专著,填补了学术空白,有助于民族关系、民族理论以及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也十分复杂。目前,学界已对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许多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但迄今为止,尚未对指导和引导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这实属缺憾。该书作者对隋唐时期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拓荒性质。

隋唐时期,非常活跃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之间的频繁来往,为各类人物观察、思考和认识民族关系以及进行理论阐述和概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丰富的资料;各类人物观察和认识民族关系的开阔视野以及不少人物对他们思想观点的深刻阐述,决定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理论深度。此外,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已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

---

<sup>①</sup>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2009年10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

该书对分析、把握和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能从整个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理解、把握和研究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即在充分了解和把握隋唐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理清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源流和演变;在充分了解和把握隋唐之后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础上,探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对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而且,该书对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规范以及丰富内容,将会推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民族关系、民族理论以及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二、建立了科学、完善的民族关系思想概念系统,完整再现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列宁曾经说过,概念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学科建设,都需要一套科学和完善的概念系统。所谓理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概念系统的创新。因为“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不是概念系统的不可能称之为—门学科、一种理论。”<sup>①</sup>作者在全面掌握、认真梳理、精心辨析、科学阐释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对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作了界定:“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几乎所有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反思是为了吸收前人的智慧,汲取前人的经验,接受前人的教训;预见未来走向,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和处理民族关系。当然,他们的反思和认识,有的属于真理,有的或许是谬误;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非常偏颇。他们对未来民族关系的预设方案,有的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的则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无论从概念的内涵还是外延来看,这一界定符合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谱系,并对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做了深入论述,从而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完整和完善的概念系统。按照这一概念系统,作者从隋唐时期各类人物

<sup>①</sup> 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2005年第2期。

的有关论著、言说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活动中,深入挖掘和剖析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作者不仅研究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及条件,而且考察民族关系思想的渊源、发展及影响,同时也重视对民族关系思潮的探讨,全面展示了各类人物思考和认识民族关系的心路历程;既挖掘、研究和提炼各类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思想内涵、理论深度,又分析他们的经历、性格、个人素养以及当时各种思潮与其思想形成的关系,也考察这些思想的实践成效、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既研究民族关系思想逐步深化与完善的过程,又考察和分析民族关系思想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也分析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实质及历史局限;既探寻这些思想合理的部分作为借鉴,也为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做出合乎理性的价值定位。同时,作者也认真分析了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流派(如对贞观年间内地派、河套派及河北派在安置突厥问题大讨论中的思想交锋的分析,对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民族关系思潮的考察,对唐玄宗时期“守典存国”与“化流无外”思想斗争的探讨等),从而使该书呈现出学术和理论上的厚重感。

三、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拓展了民族史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独特的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汉族的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千百年来文化沉积,是该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适应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伟大创造,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精神财富……,是全民族的灵魂”<sup>①</sup>。因此,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既包括汉族的思想文化,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正如该书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拥有许多与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相同或类似的基本观点,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要深刻,都要精辟,只是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已”,“需要我们对少数民族各类人物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和细致研究。”<sup>②</sup>同样,作为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应当既包括汉族各

① 杨建新:《论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2期。

② 崔明德:《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类人物对历史及当时民族关系的认识,也包括少数民族各类人物对历史及当时民族关系的认识,少数民族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人们比较关注汉族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而对少数民族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则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在《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一书中,作者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系统考察和阐述了隋唐时期少数民族政治家的民族关系思想(如第十一章的《突厥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第十二章的《吐蕃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第十三章的《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第十四章的《回纥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和第十五章《南诏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基本恢复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全貌。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极大地拓展了民族史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四、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作者认识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全方位审视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既需要具备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又需要掌握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还需要熟悉思想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崔明德教授具有历史学(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民族学(民族学博士)两大学科的教育和学术背景,既有非常扎实的史学功底,又熟悉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之他长期从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对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有所了解,这为他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也在于不断创新。通读《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全书,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创新性的理论概括。如作者认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民族关系不断恶化的根本症结,在于缺乏正确的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没有正确思想作指导的政权是作为不大、后劲不足的政权,往往会受到历史规律的捉弄和惩罚”。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唐高宗和武则天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经常茫然失措,四处碰壁。作为在京任职的中央大臣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民族关系思想资料,因而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即使有个别十分关注民族关系的有识之士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找到实践的园地。而那些长年生活在边陲的有识之士,则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在总结历代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中,形成了比较

完整、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因而基本维持了民族关系局面,使大唐王朝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中危而不倒,险而不倾”。再如作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政治家的封建帝王的民族关系思想,很容易被臣民们所接受并付诸行动,但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史学家的大臣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如果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相吻合,则比较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不合拍,则很难成为主流思想,也就很难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又是许多正确思想认识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作者在论述唐太宗贞观年间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中的思想交锋时就认为,在中国古代围绕如何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所出现的大争论或思想斗争,“如果能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论双方争论的多么激烈,观点多么对立,都是十分正常的,而且也是有益的。只要争论的双方能够针对问题、实事求是地切磋与辩驳问难,就能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即使暂时不能达成共识,也能够找出分歧的症结之所在。否则,如果出于个人或集团之私利,一切争论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很有可能将正常的争论牵扯到党争之中,甚至会将争论引入歧途”。贞观年间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划清了思想争论与政治斗争、义气之争及利益之争的界限,始终没有脱离正常思想交锋的轨道,是历史上比较成熟的思想交锋的突出代表,为思想交锋树立了样板,具有划时代意义”。“正常的思想交锋应当严格限制在思想范围之内,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据”。这些观点的提炼和概括,给人以启迪,体现了作者认识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作者所建立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范式以及对民族关系思想的持续研究和不断创新,将会引领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

凡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都会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自己所从事学科的学科建设、学科发展以及学科的未来走向。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都需要一批批学人持续不断地钻研和探索;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都需要专家学者不断地进行学术新领域的开拓和创新。崔明德教授在20年之前就提出了“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持续倡导和推动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已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一书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建立了范式,必将引领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者所建立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概念系统、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本书对许多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入细致的探讨，为研究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提供了借鉴。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时普遍采用崔明德教授所建立的概念系统，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二是作者所归纳和总结的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为有志于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了继续发挥的空间。特别是作者所提出的对汉族代表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汉化”人物和“胡化”人物等四类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以及作者所罗列的各个时期代表性的人物，为专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是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心得所归纳以及该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如全面收集梳理各种资料；把民族关系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与挖掘思想；把各种零碎的思想资料拼成一幅动态的全景画面；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审视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正确把握和提炼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多视角考察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探索各类人物民族关系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等），为青年学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捷径。

总之，该书是一部结构合理、逻辑严密、阐述全面、论证有据、表述准确、颇富新意的学术专著。故乐为之序。

杨建新

2010年2月17日

## 序 二

我与崔明德教授认识已有多年,他是我国学界颇有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令我非常感佩的是,他虽长期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工作,但他却有着浓厚的西北情结。他曾在西北工作,在西北做田野调查,在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兰州大学兼任博士生导师,他对西北历史和现实的民族问题特别关注。他经常到西北地区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他的许多论著大都是对西北历史和现实民族问题的研究。由此,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工作情况也就格外关注。我知道,崔明德教授迄今已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及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130 余篇学术论文,多篇论文被美国和韩国的学术期刊全文转载;在海峡两岸出版《先秦政治婚姻史》、《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李陵评传》、《隋唐民族关系探索》等 11 部学术专著,其中《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入选“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均作过报道。崔明德教授于 1998 年、2003 年、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获得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我对他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底、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非常赞赏;对他勤奋的工作,由烟台大学副校长升任校长,继而又任党委书记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我又高兴地看到,崔明德教授的新著《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稿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到成果鉴定,以及其中很多篇幅都涉及西北历史上的重要问题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目前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研究中具有创新意义、学术水平较高、编写质量上乘的一部专著。

第一,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民族关系思想,拓展了民族关系和民族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演进和走向,源于当时各类人物、特别是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对民族、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

势的认识、判断和观念,以及阐述这些思想而产生的影响。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和零碎。该书稿紧紧抓住这条主线,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意义、发展脉络、研究内容和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充分阐述,从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及普通民众对民族关系的基本认识、观点和主张单独抽象出来,进行系统梳理,上升到专题研究,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该书稿既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又有微观的具体考察,复原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发展脉络的整体面貌,具有创新意义。

第二,作者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阶段——隋唐,为深入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史建立了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隋唐时期既是我国民族关系全面发展且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总结,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中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的许多基本特征。书中对汉族代表人物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逐一分析归纳,既看到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全貌,又解剖了有代表性的个案,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全面而立体地显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作者能够从整个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把握和阐述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探寻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源流,而且分析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这本书的学术分量。尤其是作者提出的民族关系思想概念、理论框架以及所总结的研究方法,为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史建立了范式。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资料翔实,论据充分,逻辑严密,阐述透彻,把民族关系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古往今来,凡是有价值、有影响的史学著作,无不重视史料的搜寻、考订和阐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等大师都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主张史学研究应从研究史料入手。如胡适就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话。”(胡适:《〈文史〉的引子》,《胡适文集》第十册,第7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作者长期流连于史籍之中,全面收集和考释各种史料,扒梳民族关系思想的流变,思考民族关系思想的未来走向,使该项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书稿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以原始资料为主,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甄别和辨析。由此反映了作者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范严谨的学风,使该成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论证力。如在第五章《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

想》中,作者从充足的史实材料出发,系统梳理了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考察了其思想形成的条件,分析了他的思想的特点,论述了其思想的价值。作者认为,“从整体来看,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其中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深切体验,也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浸染,还有唐初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再如,作者依据史料深入剖析,指出《南诏奉圣乐》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突出了“西南向化”这一主题,既反映了南诏脱离吐蕃归附唐朝的现实,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希望“西戎、北狄悦服”、天下一统的理想追求。关于《南诏奉圣乐》的作者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异牟寻,有的认为是韦皋。而该书作者从多方面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严格地说,南诏异牟寻和唐朝韦皋在创作《南诏奉圣乐》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两人是《南诏奉圣乐》的共同作者”,“异牟寻组织南诏艺人创作和排练了‘夷中歌曲’,这是《南诏奉圣乐》的基础。韦皋组织唐朝和南诏的艺人对‘夷中歌曲’进行修改、锤炼和再创作,更名为《南诏奉圣乐》”。诸如此类的创见,既凸显了该书稿的学术价值,又为作者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高度抽象和概括,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使该书达到了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从书稿的内容和观点来看,作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从许多零碎的、复杂的言说和举措中,抽出共同的、本质的东西,然后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作者在论述唐玄宗时期“守典存国”与“化流无外”思想斗争时,就认为“裴光庭和于休烈关于是否送给吐蕃文化典籍的争论,并非见智见仁之争,而是反映在民族关系深层次的思想斗争。于休烈的认识是建立在唐与吐蕃会永远对立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主张绝不应把智慧输送到吐蕃那里,而裴光庭的认识是建立在唐与吐蕃会长期和好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张‘化流无外’,希望通过文化典籍影响吐蕃臣民,使他们借此提高道德文明水准,注重礼仪,对唐忠信。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于休烈的认识非常肤浅,其思想也非常狭隘,而裴光庭的认识则非常深刻,高瞻远瞩,其思想也非常开阔”。再如作者在论述陆贽的民族关系思想时认为,他的思想“虽博大精深,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熔批判性、建设性和可行性于一炉,但由于其批判性太强,涉及面太宽,不太容易被帝王所接受,因而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又如在考察李德裕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化倾向时认为,“李德裕民族关系思想的精髓是‘抚’和‘诚’,都属‘义’的范畴,而占据吐蕃维州,显然属于‘利’的范畴了。就李德裕

本人而言,由‘义’向‘利’转化,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没有朋党之争,也许他很难发生这种变化”。作者进一步认为,“李德裕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转变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从朋党之争转变其思想就显得十分狭隘”,自然应当受到后人的指责。作者正是通过对许多类似复杂问题的深入挖掘、思辨和抽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该书理论创新性的特色。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梳理和全面研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专著,它将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也为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我相信,崔明德教授将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入下去,不断拓展和完善,一定会有更好更新的成果问世。

陈育宁

2010年3月27日

# 目 录

序 一 .....	杨建新 1
序 二 .....	陈育宁 7
绪论 .....	1
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意义 .....	1
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 .....	4
三、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	9
四、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方法 .....	17
五、本书的写作设想 .....	22
第一章 隋文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25
一、隋文帝的民族关系思想 .....	25
二、长孙晟的“离强合弱”思想 .....	41
三、梁睿的“辟土服远”思想 .....	50
四、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	54
第二章 隋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62
一、隋炀帝的民族关系思想 .....	62
二、裴矩的民族关系思想 .....	78
三、段文振的民族关系思想 .....	87
第三章 唐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91
一、“爱之如一”思想 .....	91
二、“诚信”思想 .....	100
三、时代价值及历史局限 .....	104
第四章 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 .....	109

一、三种不同的设计方案	109
二、化胡为汉	113
三、“畏威怀德”	115
四、“逼近中华,久必为患”	118
五、“使其权弱勢分”	120
六、“欲绥远者,必先安近”	123
七、三种安置突厥思路之比较	125
八、对大讨论中的思想交锋之认识	127
<b>第五章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b>	129
一、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129
二、民族关系思想形成的条件	138
三、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	145
四、民族关系思想的价值	148
<b>第六章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b>	152
一、民族关系恶化之症结所在	152
二、民族关系中的几种思潮	155
三、狄仁杰的民族关系思想	159
四、薛登的民族关系思想	163
五、郭元振的民族关系思想	167
<b>第七章 唐玄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b>	172
一、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	172
二、苏颋的民族关系思想	189
三、王峻的安置降户思想	191
四、刘昉的民族关系思想	193
五、“守典存国”与“化流无外”的思想斗争	198
<b>第八章 唐德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b>	201
一、唐德宗的威信并立思想	201
二、李泌的民族关系思想	204
三、陆贽的民族关系思想	206
四、韦皋的民族关系思想	219
五、杜佑的民族关系思想	224

六、刘禹锡的民族关系思想·····	229
<b>第九章 唐宪宗至唐武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b> ·····	235
一、唐宪宗的“推布诚信”思想·····	235
二、李绛的和亲思想·····	236
三、王涯的民族关系思想·····	238
四、白居易的民族关系思想·····	240
五、韩愈对唐与西原蛮关系的认识·····	244
六、唐文宗的“天下一家”思想·····	249
七、袁不约的民族关系思想·····	250
八、李德裕民族关系思想在朋党之争中的异化·····	253
九、牛僧孺的民族关系思想·····	257
十、杜牧的民族关系思想·····	260
<b>第十章 唐宣宗至唐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b> ·····	265
一、唐宣宗的“绥柔荒远”思想·····	265
二、程宴的民族关系思想·····	267
三、牛丛的民族关系思想·····	270
四、从称弟称臣之争看唐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倾向·····	273
<b>第十一章 突厥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b> ·····	279
一、从土门结交西魏到他钵可汗“凌轹中夏”思想的 形成·····	279
二、沙钵略可汗的思想转变·····	283
三、启民可汗的民族关系思想·····	290
四、颉利可汗的民族关系思想·····	295
五、突厥贵族上层的“复国”思想·····	308
六、默啜可汗的民族关系思想·····	312
七、曷欲谷的民族关系思想·····	316
八、登利可汗的“天下一统”思想·····	320
九、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的民族关系思想·····	322
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民族关系思想·····	323
十一、西突厥匭延阙律噉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	324



第十二章 吐蕃的民族关系思想	328
一、松赞干布从威逼唐朝到“渐慕华风”的思想转变	328
二、弃隶踏赞的民族关系思想	332
三、乞立赞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337
四、可黎可足的民族关系思想	344
第十三章 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347
一、麹氏高昌首领及普通民众的民族关系思想	347
二、康国、安国、俱密、吐火罗、石国、西曹和箇失密 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	352
第十四章 回纥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	363
一、回纥民族关系概述	363
二、“世为唐臣”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367
三、顿莫贺可汗的“以水洗血”思想	375
第十五章 南诏首领的民族关系思想	385
一、南诏与唐朝、吐蕃的三角关系	385
二、《南诏德化碑》所体现的民族关系思想	390
三、异牟寻的民族关系思想	396
四、《南诏奉圣乐》的思想意蕴	400
第十六章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相关著作及作者简述	406
一、相关著作及作者的共性	406
二、常骏与《赤土国记》	408
三、裴矩与《西域图记》	410
四、吐火罗与《西域图记》	412
五、达奚通与《海南诸蕃行记》	413
六、王玄策与《中天竺国行记》	414
七、郭元振与《定远安边策》	415
八、盖嘉惠与《西域记》	417
九、顾愔与《新罗国记》	417
十、韦皋与《开复西南夷事状》	418
十一、贾耽与《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及《皇华四达记》	418